

# 引 子

公元前 206 年，项羽率众诸侯西入关中灭秦，打破了秦始皇万世一统的美梦。随后，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以梁楚九郡地置西楚国自属，分封灭秦有功将领、旧六国贵族及秦降将十八人为诸侯王。其中，他将函谷关以西，秦岭以北的原秦国疆土封给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这三位诸侯王均是秦降将，故人们称他们为三秦王，与此相应，把这三诸侯国之地称为三秦。

三秦地域按秦郡来说是秦内史及上郡、陇西、北地三郡之和，而以现在的行政区划则包括陕西的中北部、甘肃的东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部。

这一地区，从自然条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上都有极

强的一致性。虽也有学者简单地以今陕西省为三秦文化区的范围，但是秦岭以南的汉水谷地，自古至今，其地域文化都带有强烈的楚地色彩。相反，陇中与宁南黄土丘陵地区恰与关中、陕北在文化上一直保持有较高的一致性。因而，从文化区的完整性考虑，三秦文化区的地域仍应以楚汉之际的雍、塞、翟三国疆域为基本的地域范围。

不仅现在是这样，早在成书于战国时代，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禹贡》篇中就有“黑水西河惟雍州”的记载，是将这一广大地区放在同一区划内可见，从古代起，三秦地区就由于自然条件、生产方式的致，而导致了区域内部文化现象的一致，从而形成了曾在中国古代有过辉煌历史的三秦文化。

一般说来，凡人类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都可归入文化的范畴：物质文化有人们的衣食住行；精神文化则包括范围很广，有典籍制度、人们的交往方式、行为习惯、心理感受等等。也可以用《汉书·地理志》中的一段话作为我们对文化的理解：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由于文化概念过于广博，在这本字数有限的小册中不可能对三秦地区的文化现象面面俱到，故只撷取其中最能反映三秦民众性格特征和三秦地域特征的几个片段加以描写。

三秦地区由于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在中国历史上曾演出过绚丽的一幕，成为人们向往的地区。近代，它更是以中国

民俗文化博物馆和西部文化代表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那高亢悠扬的信天游、热情奔放的陕北女子、神秘古朴的陇东剪纸，把我们带入了陕北高原，带入了神奇的三秦大地……

# 一、河水一石 其泥数斗

## —— 三秦文化产生的自然、经济基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地的自然经济环境决定这一地区的文化特点与发展水平，三秦地区是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之一，这不能不与它那蓝天黄土有着密切的关系。

### 1.

乘火车沿陇海铁路西行，一进入潼关，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广袤的黄土地：渭河泛着白光蜿蜒流淌在铁路旁边，北边是低缓的黄土坡，南侧是高耸的华山与连绵不断的秦岭山脉，黄褐色的土地上点缀星星点点的村舍与耕地，偶尔在火车晃过深谷的那一刹那之间，你还会发现在陡直的谷壁竟还有一孔孔的窑洞。

这就是我们要叙说的三秦大地。

三秦的土地是黄颜色的，如同八十年代流行一时的描写陕北风情的中国“西部片”所展示的那样：蓝天白云之下，那连绵不断的黄土丘陵，犹如凝固了的黄色海洋，翻腾着黄色

的波浪，远处黄土丘陵之间流淌着涓涓细流。极目远望，没有绿色来滋润你的眼睛，只有天边偶尔传来几声悠长的信天游，尚能使你感到这并不是蛮荒时代。

在三秦大地上，最具代表性，且面积最大的就是黄土高原了。

黄土高原位于我国西北。它东起太行山，西止乌鞘岭，北抵阴山，南达秦岭，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黄土分布区。三秦地区则正处于黄土高原的中北部，也就是巨大“几”字型黄河内围起来的这一部分。这一地区我们习惯上一般分为三个部分：陕北黄土高原、陇中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其中陕北与陇中自然条件差异不大，而关中平原实际上是黄土高原南部的一个断陷盆地。

位于陕北与陇中的黄土高原，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表面平坦，而是象一块巨大的蛋糕，被流水切割得支离破碎。在地理学上，一般把这些富有特点的地貌分为两类，一种称沟谷地貌，另一类则为谷间地貌。

沟谷地貌实际上就是各种大小不同，相互从属的冲沟。这里的沟谷谷壁陡立，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干涸的，只有夏秋之季，暴雨过后，沟底里才会有奔腾的黄褐色水流，同时地面上也多出了几条小沟。在这里，最形象、也是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千沟万壑”。

沟谷地貌之间的是谷间地貌，谷间地貌主要有三种类型：塬、梁、峁。

塬是顶部平坦，四周有深谷与其它塬相分离的地貌，它是黄土高原经现代沟谷分割后存留下来的高原面，塬与附近沟谷的相对高差一般都很大，彬县、长武一带可达 350 米。塬

是黄土高原面受侵蚀最小的一种地貌，然而也不断受到冲沟的蚕食。周原先周时面积覆盖今日的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与宝鸡、眉县、乾县、永寿四县的小部分，东西长 70 多公里，南北宽 20 余公里，至魏晋时期就分割出一个积石原，唐代添了三畴原与西原，后来又陆续分出了五畴原、石鼓原、彭祖原、七里原、治原等，现在的周原已被沟壑切割成南北走向的长条形，最宽处仅 13 公里，可见流水侵蚀之迅速！

塬是黄土高原上最适宜于人类生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的南部，即泾水、洛水之间。其中面积最大的是陇东的董志塬。

董志塬位于泾河支流蒲河与马莲河之间，长 80 公里，宽 40 公里，面积达 2200 平方公里。这里不仅塬的面积广袤，还是黄土高原的厚度中心，黄土厚度达 200 米。

黄土塬继续为流水侵蚀，逐渐变为一条条狭长的地形，这就是黄土梁。

梁是黄土塬继续冲蚀的结果，在黄土高原上，黄土梁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这里，一道道梁排列在一起，形成了梁状丘陵，梁之间则是大小不等的沟谷，当地人对这种地貌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两沟夹一梁”。

梁再接受流水的侵蚀，同时受下伏地形的影响，这就形成了黄土峁。峁是黄土梁的坡水侵蚀较强，凸形坡的中间显著隆起而四周斜坡较陡的黄土丘陵地貌。从飞机上向下看，峁就象一个个窝窝头密集地堆放在陕北至陇中这一大片土地上。

梁峁的分布位于塬之北，这里的地形最为破碎，植被最

稀少，自然环境也最恶劣，是我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在这片以黄色为基调的土地上，流淌着几条也以“黄色”著称的河流。

黄河，一向被世人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以那博大的胸怀哺育了上亿的炎黄子孙，也以它那奔腾不息，桀傲不驯的巨流，肆虐着它下游的人民。然而黄河的个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黄土高原赋予它的。

黄河自青海巴颜喀拉山发源，在源头地区，它是温柔而宁静的少女：河水徜徉在湖沼草滩之间，接纳了大量雪山融水的滋补，河水清澈，水量丰富。在这里是无法寻找到它在中、下游那种狂燥的影子。

河水一出青海境界，就由我国地势的第一级阶梯猛降至第二级阶梯，这时的河水先经过一系列串珠状的 19 个大小峡谷。这些峡谷基本上都属于陇中黄土高面，由于疏松的黄土极易被侵蚀，这里也就成为黄河河水泥沙的重要“补给区”了。这里的黄河崖陡峡窄，浪大水急，黄土丘陵排列在河床两岸，不时有大块的黄土跌落进河谷，刹那间即被黄褐色的河水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从这里起黄河已是名符其实的“黄色的河流”。

青铜峡过后，这时不再是高山峡谷，进入了鄂尔多斯高原。这里的黄河象一匹跑累了野马，安静地流淌在高原面上，用挟来的陇中黄土堆积出了塞外两个著名的平原：宁夏平原与河套平原，并用河水滋润了这两个平原，使它们成为荒漠上的两颗璀璨的明珠。

河套平原过后，一出河口镇，黄河猛然掉头南下，奔向晋陕大峡谷。穿行在晋陕峡谷的黄河如同一匹狂奔的骏马，又

象一只怒吼的雄狮，一路挟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奔腾向前。据专家们估计，每年黄河在这里带走的泥沙多达 15.7 亿吨。自古这里就有“河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这里的黄河两岸峭壁对峙，河面仅宽 30~50 米，尤其是壶口至龙门这一段，有“咆哮万里触龙门”的壶口瀑布。急流奔腾的河水直向悬崖冲下，从 10~20 米的高处跌落下来，浪花飞溅，波涛翻滚，激起的水雾飘浮在天际，远达数里之外即可看见；狭窄槽深，巨流匍匐落下，声如雷鸣，震耳欲聋。郦道元《水经注》中曾是这样描写壶口瀑布的：“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看，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濤波颓叠，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适也”。过了龙门，黄河又穿行在汾渭谷地中，河水流速减缓，带来的陕北黄土高原的泥沙开始沉淀，一直向下游堆去。

因此，可以说是黄土高原造就了黄河。而黄河之所以能挟带如此多的泥沙，这主要是由于黄土质地疏松，垂直节理发育，抗侵蚀能力差。同时黄土高原地区又位于我国季风区的最西部，夏季风至此已是强弩之末，只能在夏秋相交的七、八、九三个月给这片干涸的土地带来一些降水。但降水不是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而多是瓢泼大雨，倾盆而下。由于黄土高原的植被覆盖率低，大量的黄土就被急速的坡面径流冲至沟谷乃至于黄河中。当地的民谚：“一场雨冲走一犁土”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

流经黄土高原的还有两条较大的河流，泾河与洛河。

泾河发源于陇东山地泾源县的老龙潭，东南穿过黄土高原南部在高陵县泾渭堡注入渭河，全长 450 公里。泾河也是

一条典型的黄土高原上的河流，泥沙含量甚高。战国末年秦国修郑国渠，引泾水灌溉关中东部的的大片盐碱地，当时称泾水为“填阨之水”；就是利用泾河水中大量的泥沙改造大片的盐碱地。

洛水发源于陕北白于山地的草梁山，向东南纵贯黄土高原。河流岸高谷深，切入黄土塬约 100 米左右。进入关中平原后，谷宽水缓，流路曲折，在华阴附近注入渭河。

在陕北与陇中黄土高原地区北部还有一些较小的河流，这些河流虽然水量很少，但对干旱的黄土地区人民的生活影响仍然较大。

在黄土高原的南部边缘，有一块一直为人所称道的地区。这里不同于单调的黄土高原，河网密布，沃野千里，平原上密布着村落与农田，这就是三秦最肥饶的地区，也是以建都最久而著称的关中平原。

关中平原，又称渭河谷地，是在渭河干支流冲积作用下形成，号称八百里秦川。它北起北山，南止于秦岭，是介于黄土高原与秦岭之间的渭膏壤。平原西起宝鸡峡——渭河出山口，东达潼关，东西长 360 公里。宝鸡一带平原狭窄，向东逐渐展开，呈为一开口向东的喇叭形，至西安以东宽达几十公里。平原地势平衍，海拔 300~600 米之间，渭河自西向东从中部穿过，两岸平畴沃野，为河流阶地与原隰相间的黄土台原。这些台原阶地顶部宽平，既有利于农耕，又可免遭洪水的淹没，是生产和生活的理想所在。

关中平原也不例外，也是黄土高原的产物。发源于陇西渭源县鸟鼠山，经过陇中黄土高原而进入关中的渭河，同样也是泥沙含量很大的河流。宝鸡峡以上穿行在黄土区，水流

湍急，沿途挟兵带有大量的黄土，一出宝鸡峡，河床便开阔起来，泥沙逐渐堆积在河床上，先形成阶地，后延展开形成了宽广的平原。在成语中有“泾渭分明”一词，就是说泾水注入渭水时，由于渭浊泾清，在汇流处分明地显示出两股不同颜色的水流，这一清一浊的水流往往经过几百米的距离才混同起来。可知渭水泥沙含量之高。

三秦地区的黄土由于组织疏松，易于挖掘而最早成为使用原始农具的先人们栖息的地区。同时气势磅礴的黄河与舒缓的渭河又为三秦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灌溉与交通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三秦地区就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也是我国农业最早发展的地区。

## 2.

三秦地区是我国农业的发祥地之一。

传说中的神农氏，是我国农业种植的开创者，他的主要活动都是在宝鸡清姜河畔；而夏朝的农官据称是周人的首领后稷，现在关中西部的武功还遗留着后稷的“教稼台”。当然这些传说大都是后人的附会，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关中农业的状况。

考古发掘的结果也充分显示出关中早在新石器时人们已从事定居的生活了。聚落范围的确定、遗留下来文化层堆积的深厚，以及所用的生产工具都可以说明当时的生产情形：人们用原始的石制刀铲挖掘疏松的黄土，种植一些耐旱的品种。在半坡遗址中人们发现有储存在陶罐中的粟粒，华县泉护村遗址也有同样的发现，可知粟是当时关中普遍种植的农作物。

关中虽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但降水较少，加之当时还无灌溉可言，故种植耐旱的粟是符合当时的自然条件的。

当时的人们也还从事采集业，但只是作为农业生产的补充。在新石器遗址中，还杂有石制和陶制的纺锤，这不仅显示出当时人们生活的丰富内容，也显示出农业经营已有了较大的范围。

关中的农业是周人迁豳、迁岐之后有所发展的。

周人最早是居住在泾河中游地区，即今彬县、旬邑一带，当时称为豳。他们在那里居住了三百多年，到古公亶父时，受到了北方游牧部落的压迫，就翻越梁山、经过杜水，到了漆水附近，止于岐山下的周原。在其东边，泾渭河下游当时属商王朝的控制范围：在今户县东北的是崇国，三原、兴平之间的是荡社，他们都是商王朝在西方的诸侯。

周人是经营农业的部落，当他们初到豳时，就在那里“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到了周原，同样要疆理田亩，按时耕种。当时的周原面积广大，植被茂密。周人初到岐下就看到“周原既臝 萑荼如飴”而岐山山坡上又是“柞棫斯拔 松柏斯兑”。当时的自然条件是很适宜于发展农业的。

周人使用的农具种类已很丰富，有耒、耜、钱、镈、铎等。耒是有把的尖木棍，用来翻土，耜是在耒齿上加上金属尖头，钱即锹，镈相当于锄。周人对耕作技术也有一定的发展，采用了休耕的耕作方式，也懂得进行田间管理：除虫、除草、施肥，尤其是用杂草腐烂后做绿肥，取得了较好的收成。《诗经》中的《周颂》和《小雅》等章都有反映当时周人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的情况。

周人对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每年春耕开始，周天子

要在镐京举行盛大的春耕仪式，称为“籍田礼”。周天子亲自用青铜铲锄土，卿大夫们尾随其后。这一仪式由后来的统治者所继承，直到清王朝的垮台。

西周时期，关中的农业地区远较以前有了扩大，农作物种类也比以前有了增加。《诗经》中说“黍稷重穋 禾麻菽麦。”可以看出这几种农作物在关中地区种植的普遍。这几种作物中，黍稷是最重要的，这在《诗经》可以明显地看出。黍稷在关中农作物中占主要地位的原因是关中土壤虽很肥沃，但气候干燥，雨量不足，年降水量只有 550—700 毫米，而黍稷是耐旱的农作物，对缺雨的关中十分适宜。关中也有大片的盐碱地，在盐碱较轻的土地上，黍稷也能有一定的收获。周人以稷称他们的先祖后稷，不是偶然的，这说明稷在关中的种植为时已久。粟也是当时普遍种植的作物。

除去这些耐旱的作物以外，人们还在低洼的地区种植了水稻。《诗·小雅·白华》有这样的句子：“漉池北流 浸彼稻田”。漉池在现西安的西北 正当渭水与丰水、镐水之间。《诗·豳风·七月》篇还提到“十月穫稻”，则泾水中游也有稻的种植。

豆类的种植也是周人农业中的重要部门。据说周人的先祖后稷已“芒之荏菽，荏菽旆旆”。同样人们已开始种麻，麻不仅是衣着的原料，麻子还可以作为食油。

这么丰富的农作物品种，表明了西周时关中地区农业的发达。在一些诗篇中记载了当时收获是相当丰盛的。虽然这时人们在利用自然环境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克服自然环境不利因素方面能力十分有限。如在西周厉、宣、幽、平王时期，关中地区旱灾频繁，农业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同时，西

周时期关中人口稀少，而使关中宜农土地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铁器的使用使各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当时据于关中的是落后的秦国。秦为了变法图强，采用了商鞅提出的“重本抑末”的政策，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这一思想随着秦统一六国而成为贯穿古代中国始终的最重要的经济方针。

商鞅在秦颁布变法政令，其中一条为废井田开阡陌，这说明此时耕地面积有所扩大。同时，他令秦人“大小繆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开垦新的土地，是需要相当多的人力，商鞅因此更设法招诱三晋人民入秦耕作，增加了秦在关中的耕地面积。农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秦国的富强。

在秦逐渐强大之时，曾有过这样一个小插曲：公元前 246 年，韩桓惠王为了延缓秦国东进的速度，使秦国无力东征，派水工郑国赴秦国行“疲秦”之计。郑国到秦国后，游说秦王政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并为秦设计了引泾入洛的水利灌溉工程。不料工程进行的中间，韩王的计谋败露，秦王政要杀郑国。这时郑国非常冷静地对秦王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王想想是这么回事，于是仍然让郑国继续主持修渠。十年后，这条自中山西邸瓠口引泾水，沿北山向东注入洛水长三百作里的郑国渠修成。当时的灌溉面积达四万多顷。泾河水中大量的泥沙，覆盖在大片盐碱地上，增加了土地的肥力。“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

秦祚短而亡，西汉建都长安，继承了秦在关中的经营。西

汉初年因长期战乱，黄河流域经济凋敝，“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于是汉高祖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一方面令战士解甲归田，另一方面为繁荣京师长安，防止六国贵族蠢蠢欲动，将六国旧贵族大量迁往长安。这时长安所在的关中人口激增，人数达 240 多万，迫使西汉统治者不遗余力的修建关中的水利工程。

关中的黄土地带必须经常灌溉才可能有较好的收获，这从郑国渠的修建中就已为统治者所知。关中地区水网尚称密集，泾渭诸水流贯其间，故西汉统治者利用这些自然水道先后兴修了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轺渠和成国渠等。其中漕渠是最先修建的，《汉书·沟洫志》记载道：

“时郑当时为大司农，言‘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上，度六月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溉。此损漕有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上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民颇以得溉。”

这条漕渠起自长安西南昆明池，一直与渭水并行东流入黄河。这一段正当渭水下游，渭河河道曲折蜿蜒，运输漕粮极为不便。漕渠修成后，不但灌溉了万顷良田，也大大缩短了黄河至长安的距离。

在洛水下游又修建了龙首渠。龙首渠是一条井渠，也就是说它类似今天流行在新疆的“坎儿井”。当时“发卒万人穿渠，自徵（今澄城）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有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绝商颜，东至山领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龙骨，故名曰龙首

渠”。

渭水的中游则修建了成国、灵轺、蒙茷诸渠，由郿县蜿蜒达于渭城（今咸阳）。西汉中叶，郑国渠已经逐渐失效。人们先后开凿了六辅渠和白渠，继续发挥泾水灌溉的作用。当时人们所利用的水流还不只这些。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这样描叙过长安附近：“终始霸浚，出入泾渭，沔郾潦滹，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也就是说在长安附近当时已形成了一个水利灌溉网了。

除了在关中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外，人们同时还改进了耕作方法，采用了一些新农具。如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关中耕作经验，发明了代田法。这是一种田园耕作技术，反映了当时关中已采用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故劳动生产率极高。赵过还创造了耦犁与耨车，推广牛耕，这也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因此关中农业在全国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司马迁对此高度评价：“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殖五谷，……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两汉之间，长安与关中破坏惨重，死者数十万，致使“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农业生产则无从谈及。以后局面稍有稳定后，马援率兵，进驻关中，竟然在上林苑中屯田，可见关中破败之惨烈。东汉末叶，这里又和羌人发生了连续不断的战争，关中成了实际上的战场，农业生产一败涂地。史载，公元 316 年刘曜兵临长安城下，“京师甚饥，斗米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

关中农业的恢复要到隋唐时期了。隋唐建都关中，大量的人口聚集于此，必须就近解决粮食问题。故唐初就开始着手于关中的农田水利，不但修复了以前许多旧渠，还新修了一些水利工程。贞观年间，在韩城自龙门引黄河水灌溉田地六千多顷。在同州、华州也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当时人们对关中水利的修筑，并不仅是恢复以前各渠道的遗迹，而是尽量运用所有水流。长安附近的沔、镐、灞、泾、潏、涝诸水，都被人们利用起来，在这些河流上修了兴成、五门、六门、龙门、泾堰、滋堤等堰，设有专人管理，其下的支渠也设有渠长、斗门长。在渭水以北还有利用潏水的升原渠。这些渠道在整个唐代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永徽年间，郑、白二渠尚能溉田万顷。

虽然如此，由于关中聚积了大量的人口，尤其是大量消费性人口，加之关中平原面积有限，虽土地垦殖指数已达到很高，但仍满足不了对粮食的需求。当时关中人口已远远超过西汉，达 320 万之多，加上不在户口统计之内的少数民族与驻军，人数更多，这样庞大的人口，关中自难负担，故终唐一代多次发生皇帝率领百官至东都洛阳就食，在德宗时期，更产生粮食供应的困难。《资治通鉴》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德宗时，关中粮仓中粮食用尽，已致禁军无饷可发，禁军们就摘掉头巾上街游行，而德宗却束手无策。直到几日后，润州（镇江）的镇海节度使韩湿才运粮至长安。德宗知道这一消息后，高兴地对太子说：粮已运到，我们父子得救了。

宋元以降，关中不再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其经济发展也适应了这种变化，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农业区。

宋代关中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经济地位随之有所下降。

加之唐末的战乱，使这里人口流失，水利失修，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为恢复和发展关中的农业生产，关中人们做了许多努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恢复郑、白二渠。

北宋初年，郑、白二渠溉田面积已不及 2000 顷 地方官吏对此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成效都不大，直到熙宁五年，神宗针对关中地区农业不振的状况，下诏曰“灌溉之事，农事大本。……然三白渠为利尤大，……自可极力兴行。”当年十一月，在都水监丞周良孺的主持下，开始了由石门至三限口的引泾入渠工程。工程完工后，郑、白渠的灌溉面积恢复到三万余顷，几乎达到西汉时的水平。

除了郑、白渠这样大型的水利工程外，宋代在关中平原还兴复了一些小型水利工程。如宋人“杜曲田皆亩一金，源发清泉随种稻”的诗句，描写的就是在长安城南杜曲一带汲引泉水种稻，以致农业兴盛，地如金贵的情形。

经过广泛兴修水利事业，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虽不能与盛唐时相比，但每年仍有大量的农产品运往朝廷和西边的战场。宋初规定每年陕西漕运的粮食达 80 万石到京师，占当时漕粮总额的 14.5%。后来虽由于宋夏战争升级，而停止了向京师漕运粮食，但输往边地的军粮却每每需要从关中等地供给。可见宋代关中的农业水平在整个北方黄河流域仍居领先地位。

### 3.

黄土高原覆盖着深厚的黄土，高原面密布着大小沟壑，北部三边地区，沙丘之间有湖沼草滩，这样的地理条件是不适